

## 破冤氣與回天意—— 濟王爭議與南宋後期政治(1225-1275)

方震華\*

因南宋理宗即位而引發關於寧宗皇子濟王趙竑的爭議，延續長達 50 年，影響南宋後期政局甚巨。此一爭議由知名理學家發動，強調對趙竑的處置事關「綱常」，要求理宗給予追贈，並指定後嗣。理宗親政之後，雖追贈趙竑官爵，卻堅拒為其立後的提議。由於為捲入皇位之爭而死的宗室立後，在歷史上早有先例，抗議者為說服君主，不斷訴諸天意，每當災害或異象產生，官員、士人即以濟王訴冤於上帝，或濟王之冤氣導致災害為由，上書要求為濟王立後。這類根基於傳統天人感應的論點，在當時得到眾多官員、士人的支持，而蒙古軍不斷入侵，更使抗議者相信國運衰頹，都是濟王含冤未雪的結果。理宗及其繼承人一再拒絕立後的提議，造成君臣關係緊張，官僚也藉此事作為打擊政敵的理由，造成朝政的動盪。到了德祐元年，在元兵已逼近臨安，統治者才在官員的一再要求下，同意為濟王立後，希望能藉此挽回亡國厄運。不過，這種期待很快隨著宋恭帝的投降而破滅。對於經歷亡國之禍的士人而言，君主不肯化解濟王之冤，造成上天震怒，降下兵禍，成為他們解釋南宋滅亡時一個常用的觀點。

關鍵詞：宋理宗、濟王、理學、天人關係、史彌遠

---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一、前言

由於皇帝是中國歷代王朝政治運作的核心，因皇位繼承而產生的政爭可謂無代無之。鬥爭中失勢的一方慘遭迫害或殺戮，不再為人所重視，成為常見的結果。但在宋代，文官與士人卻熱衷於為繼承紛爭中失敗的一方訴冤，請求事後的補償。元代官修的《宋史》，特別指出宋朝在處理宗室問題上與前代相異之處：

且宋於宗室，稍有過差，君臣之間，不吝於改，尤不憚於言。

涪陵、武功，真宗即位，尋議追復改葬，封其子孫。濮邸尊稱，

言者惟務格非，不少避忌。宋末濟邸，國事將亡，諫疏不息，

必褒卹而後止。是蓋歷代之所難得者歟！<sup>1</sup>

指出在處理宗室議題上若產生爭議，官員往往直言無諱，迫使君主改變作法，並舉四項牽涉繼承問題的事件為例。包括：太宗(939-997, 976-997 在位)先逼死姪子武功郡王德昭(951-979)，後來又以弟弟秦王廷美(947-984)圖謀不軌為由，降封為涪陵縣公，貶謫至房州而死。英宗(1032-1067, 1063-1067 在位)即位後是否尊稱生父濮王(995-1059)為「皇考」的爭議，以及南宋晚期要求為濟王(?-1225)立後的呼聲。在這些事件中，朝臣往往積極表達異議，最終得以說服君主，為死者追封。如果說這是宋朝歷史的一項特色，則其所代表的意義值得探究。

在上述的4件爭議中，持續時間最久的，是因理宗(1205-1264, 1224-1264 在位)即位而衍生的濟王案。整個爭議始於理宗寶慶元年(1225)，直到德祐元年(1275)，恭帝(1271-1323, 1274-1276 在位)下令選擇宗室為濟王後嗣，才告停止。當時元兵已經渡過長江，直逼臨安城下，南宋政權已

---

<sup>1</sup> 脫脫等編，《宋史》，卷244，〈宗室傳一〉，頁8666。

是日薄西山。在這長達 50 年的爭議期間，南宋政權面臨嚴重外患與財政困境，政務待舉之事甚夥；為何官員們持續重視為已死的濟王追封、立後，不惜一再上書批判，引發政治風潮？

重視為政爭中的受害者申冤，與宋代的政治傳統有關。宋太祖(927-976, 960-976 在位)雖靠軍事政變奪取政權，但很注意如何合理化自己的權力，在兵變的過程中嚴禁士兵擅殺與劫掠。後來的文士更加美化這一點，強調太祖得天下，不殺一無辜。<sup>2</sup>因此，若有人無罪而負冤，即重視為其平反。例如：仁宗(1010-1063, 1022-1063 在位)朝名將狄青(1008-1057)因受到朝中文臣毀謗，被罷去樞密使，外放為知陳州，不久即死於任所。神宗(1048-1085, 1067-1085 在位)即位後，對其子狄諤說：「圖中見乃父遺像，恨不及識之，如聞當時亦有讒之者，朕為愴然。」乃派遣宦官攜帶御製祭文，至其墓前祭拜以雪其冤。鄭獬(1022-1072)在為神宗代筆撰寫祭狄青文後，特別寫了一篇序文，闡明神宗此舉的意義：

進[狄]青以樞密使，久之有飛語，不復自辨，遂請解機軸而去。……明年遂薨，齎其謗言歿於地下矣。……上親為製文以祭之，又以一言明其讒，則青之功烈愈表表明白，亘乎無窮而不可磨；其平生鬱積之氣，負於九泉者，亦已爆然破壞矣。於此之時，仗鉞之臣、冠鵷之夫伏讀而傳誦之，莫不竦首頓足，却立而四顧，思為國家橫戈擐甲，爭先以鞭撻四夷。<sup>3</sup>

認為含冤而死者會將鬱積之氣帶入地下，必須由君主為其平反，才能將此種冤氣加以破除。神宗祭祀狄青不僅安慰死者，更是激勵時人的忠義之氣，以掃平四夷。由此可見，為已死者雪冤，被視為有利於國家未來之舉。在此傳統下，晚宋的君主抗拒追贈濟王的提議顯得頗不

<sup>2</sup>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建隆元年正月，頁 3。

<sup>3</sup> 鄭獬，〈御祭狄青文〉，收入胡聘之編，《山右石刻叢編》，卷 14，頁 19；鄭獬，《鄭溪集》，卷 14，〈御製狄公祭文序〉，頁 12。

尋常，其間的考量因素與其所訴諸之理由皆值得深究。

過去學者對於濟王案的討論集中在知名理學家真德秀(1178-1235)等人為其訴冤的層面。<sup>4</sup>史彌遠(1164-1233)自嘉定初年主政後，援引諸多理學之士，朱熹(1130-1200)、陸九淵(1139-1192)等大師的後學紛紛活躍於政壇。濟王案確實造成理學中人與主政者嚴重對立，部分人士甚至從此隱居不仕。但是，出身理學團體的官員亦有持相反立場者，朱熹的學生李大同(1164-1250)就是一個例子。李大同在端平初年與當時的理學領袖真德秀同為侍講，真德秀曾對理宗稱讚其學術見解不凡。<sup>5</sup>但到了嘉熙年間，李大同卻以諫官的身分，打擊為濟王訴冤的王邁(1185-1248)，其所持之理由竟為王邁交結真德秀。<sup>6</sup>由此可見，學術之同道，未必不為政治上的論敵。更重要的是，濟王爭議延續甚久，為其訴冤者人數眾多，並非只有理學中人，例如因論濟王事而貶死象州的胡夢昱(1185-1226)與徐瑄(?-1228)，就與理學團體沒有什麼淵源。<sup>7</sup>可見，濟王案的爭議固然由理學家發動，但其訴求顯然具有某種的正當性基礎，才得以對抗皇權，使爭議長期延續。因此，研究濟王案，不僅可以作為分析晚宋政治發展的重要線索，也可以了解當時的文化現象。本文從探討

<sup>4</sup> 張金嶺、吳擎華，〈晚宋理學家對僭越權力的加入、疏離與抗爭——立足於晚宋時期理學家為濟王鳴冤的考察〉，頁 91-99；關長龍，〈兩宋道學命運的歷史考察〉，頁 439-440。

<sup>5</sup> 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 18，〈講筵進讀手記〉，頁 36。

<sup>6</sup> 李大同的生平見脫脫等編，《宋史》，卷 423，〈李大同傳〉，頁 12642-12643；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卷 3，〈理學〉，頁 37-38。其彈劾王邁之事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152，〈驪軒王少卿墓誌銘〉，頁 3905。

<sup>7</sup> 張金嶺將為濟王訴冤者皆視為理學家，關長龍已指出部分人士不能「遽定為道學人士」，見關長龍，〈兩宋道學命運的歷史考察〉，頁 439。徐瑄的生平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 86，〈大理少卿贈集英殿修撰徐公墓誌銘〉，頁 7-13。胡夢昱生平見胡知柔編，《象臺首末》，卷 2，〈行述〉，頁 21-24。

爭議的焦點出發，在分析抗議者的政治行動與主張之外，更注意其背後的價值觀念，分析為濟王訴冤者的訴求，以及他們合理化自身主張的理由。透過這樣的研究，希望有助於釐清晚宋複雜的政局變化，以及南宋的官僚文化與價值觀念。

## 二、爭議的焦點

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寧宗(1168-1224, 1194-1224 在位)因病停止上朝，至閏八月病死，右丞相史彌遠排擠被認為最有希望繼位的皇子濟國公竑，而擁立原為皇姪的沂國公昀即位，是為理宗。趙竑隨後被封為濟王，送往湖州居住。對史彌遠而言，擁立理宗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挑戰，也是最大的成就。事成之後，他對從旁協助此事的鄭清之(1176-1251)說：「今日捨昏立明，于一夕之間。」得意之情溢於言表。<sup>8</sup>理宗在短短幾天內從被立為皇子到繼承皇位，固然出人意外，卻沒有立即引發公開的爭議與動亂。<sup>9</sup>當時的官員也不避諱提及史彌遠的擁立之功。例如，理宗即位後有意起用已辭官多年的劉宰(1166-1239)，劉宰乃寫信給史彌遠，辭謝所得的官職，他在信中一開始就稱頌彌遠的擁立之功：「仰惟大丞相獨運化鈞，協成乾造，親扶日轂，直上天衢。使四時調玉燭之和，萬國仰金城之衛，宗社幸甚，海宇幸甚。」<sup>10</sup>指史彌遠「獨運」教化之權，協助楊太后(1162-1232)，「親扶」理宗登上皇位。顯示劉宰並不認為明指宰相介入皇位繼承是不當的。又如真德秀在寫給宰相史彌遠的信中，提及皇權的轉移：「先皇帝奄棄群臣，皇

<sup>8</sup> 方回，《桐江集》，卷4，〈鄭清之所進聖語攷一〉，頁597。

<sup>9</sup> 趙昀即位過程的詳細討論見方震華，〈轉機的錯失——南宋理宗即位與政局的紛擾〉，頁2-6。

<sup>10</sup> 劉宰，《漫塘文集》，卷7，〈上史丞相一〉，頁1。

太后以天下之母圖回於內，大丞相以社稷之臣計慮於外，援立聖明，登踐宸極。」<sup>11</sup>同樣不避諱提及史彌遠與楊太后一外、一內合作擁立天子的事實。顯然，寧宗在臥病前並未冊立皇太子，也就沒有絕對確定的繼承人選。在寧宗死後，楊皇后成為宮廷的主人，與外朝的宰相聯手決定新君的人選，其合理性很難被質疑。事實上，由於文臣在宋代的政治運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介入皇位繼承早有前例。在高宗(1107-1187, 1127-1162 在位時代，史彌遠的父親史浩(1106-1194)就是輔佐孝宗(1127-1294, 1162-1189 在位)成為儲君的重要人物。<sup>12</sup>當乾道年間孝宗在諸位皇子中挑選太子人選時，宰相虞允文(1110-1174)是重要的諮詢對象。乾道七年(1171)，失去繼承資格的二皇子慶王(1146-1180)被任命為判寧國府，在離京赴任之際，特別對前來送行的虞允文說：「更望相公保全。」<sup>13</sup>顯然認為虞允文對自己的未來命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南宋文臣對皇室內部事務介入之深，由此可見。

但是，史彌遠捨棄已立為皇子多年的趙竑，改立原為皇姪的趙昀，不免令人質疑是以個人之私意代替寧宗決定繼承人選。一個流傳於宋末元初的故事正可反映此種看法：

穆陵繼統，實史相彌遠擁立之功。楊文元公簡，史之師也，以列卿召對。上從容問曰：「聞史相幼嘗受教于卿。」簡對曰：「臣之教彌遠者不如此。」上曰：「何謂也？」對曰：「彌遠視其君如奕棋。」上默然。罷朝，上以語彌遠，彌遠對曰：「臣

<sup>11</sup> 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38，〈上相府書〉，頁1。

<sup>12</sup> 參見 Richard Davis,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 55-56；夏令偉，〈論史浩的兩次拜相及其原因——史氏相權與趙氏宮的關係研究之一〉，頁40-45。

<sup>13</sup> 李心傳著，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2，〈上德二·己酉傳位錄〉，頁521-522；佚名，汝企和點校，《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1，頁6-7。

師素有心疾。」<sup>14</sup>

記載此一故事的俞德鄰(1232-1293)活躍於宋、元之際，但所述的内容恐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傳聞。楊簡(1141-1226)是陸九淵的高足，也是史彌遠的老師，理宗對其十分禮重，即位的次月即下詔加贈楊簡官銜，隨後於寶慶元年八月徵召其入朝。<sup>15</sup>當時楊簡年事已高，始終以臥病為由婉拒朝命，因此遭到言官李知孝(1170-1238)的批評，他顯然沒有機會至臨安與理宗進行對話。<sup>16</sup>編造且流傳此一故事的人恐怕是不敢直接批判史彌遠，而轉借其師之口，表達對彌遠以一己之私決定皇帝人選的不滿。

儘管理宗即位後，擁有發言與書寫權力的官員、士人並未有公開的抗議，一群湖州的居民卻將對史彌遠的不滿化為具體行動。在潘壬(?-1225)等人的領導下，於寶慶元年正月以武力擁立當時已遷居湖州的趙竑為帝，發布榜文指責史彌遠擅自廢立。由於缺乏資料，目前對於起事者的確實身分與動機已無從掌握，但他們顯然人數有限且沒有得到外援，使得行動很快失敗。<sup>17</sup>史彌遠隨後派人逼死趙竑，對外則聲稱是病死，理宗依慣例宣布輟視朝三日，以示悼念。<sup>18</sup>到了四月間，理宗下詔追贈趙竑少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等官爵，但支持史彌遠的官員一再藉由指責濟王的過失來封駁詔命，最終使追贈之典不克施行。<sup>19</sup>同情濟王的官員對此深感不滿，知名理學家魏了翁(1178-1237)首先

<sup>14</sup> 俞德鄰，《佩韋齋集》，卷 19，頁 6-7。

<sup>15</sup> 不著撰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 31，嘉定十七年九月，頁 3；寶慶元年八月，頁 8。

<sup>16</sup> 脫脫等編，《宋史》，卷 422，〈李知孝傳〉，頁 12622；錢時，〈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收入楊簡，《慈湖先生遺書》，卷 18，頁 20。

<sup>17</sup> 湖州事變的研究見 Richard Davis,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7-103.

<sup>18</sup> 脫脫等編，《宋史》，卷 41，〈理宗本紀一〉，頁 785-786。

<sup>19</sup> 脫脫等編，《宋史》，卷 41，〈理宗本紀一〉，頁 786；卷 246，〈宗室

發難，指責朝廷草率處理趙竑後事，將引發政局不安：

陛下之於濟王，錫之珪符，爵之茅土，居之輔郡，贊書旁午，恩意優渥。……然而，為之師傅，既無賈誼始終梁勝之忠；謹視盜賊，又無張敞保全昌邑之智。不幸而見汙匪人，以殞厥命，而陛下未聞有「愧謝袁盎，輟食哭甚哀」之意。自三日罷朝之後，其餘恤典雖略講行，而人不盡知，使陛下所以孜孜愛兄之初心，亦未能盡白於天下，遂使訛言胥動，併為一談。且濟王之卒，凡有耳目，誰不睹聞，而小民無知，妄相騰播，莫肯奠居。近在畿甸間，猶不能家至戶曉，遠而荊、襄、川、廣，襲訛承舛，抑又可知。萬一有盜賊小人乘間伺隙，假託名字以為亂階，雖亦終於自斃，而目前塗炭無及於救。……今若內出手書，深惟既往之悔，明諭聖志，而圖所以厚其終者，使天下曉然無惑於浮言，則日月之明，其食、其更，莫不咸仰，此所以通天下之志，而銷禍亂之本，何疑、何憚，而久不為此？<sup>20</sup>

魏了翁認為湖州事變導致濟王的名聲為盜賊所污，濟王也因此而死，理宗在事前未能防範於未然，難辭其咎。但是，理宗既未能如漢文帝(203-157 B.C., 180-157 B.C.在位)因淮南王劉長(199-174 B.C.)之死而對袁盎表達慚愧之意，也未能慎重處理濟王後事，展現友愛兄長之心。這些缺失將引發人心不安，日後恐怕有人假借濟王之名為亂。因此，了翁建議理宗毅然下詔悔過，承認過去的缺失，並隆重處理濟王的後事，以消弭流言可能造成的危害。

魏了翁的意見與主張追究濟王之罪的官員針鋒相對，開啟了爭議

---

鎮王竑傳》，頁 8737。

<sup>20</sup>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 17，〈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論〉，頁 3-4。魏了翁此奏確實的進呈時間並不清楚。奏書中批評理宗自即位以來未下求言之詔，當上呈於寶慶元年五月四日理宗下詔求直言之前。



的序幕。隨後真德秀在六月十二日上殿的奏事中，對理宗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真德秀首先強調「三綱」為立國之本，指責理宗「處天倫之變，未盡其道」的疏失。接著為濟王辯護，指湖州事變並非出自其主謀，且濟王「前有避匿之跡，後與討捕之謀」，顯見無意與亂黨合流，這些說辭都在反駁彌遠之黨宣稱濟王為「叛逆」的說法。最後，德秀建議對濟王的處理，應仿效太宗在秦王死後給予封贈的前例，由於濟王未有子嗣，理宗也應為其立後，以扶持綱常，挽回「天、地、神、人之心」。<sup>21</sup>真德秀從人倫綱常出發，要求理宗作出挽回天意、人心的舉措，將濟王案由政治事件提高成道德爭議。這一點其實是多位理學家的共同看法，例如朱熹的學生李燾在得知趙竑為史彌遠所廢後，即以此事「三綱所關」，從此隱居，拒絕出仕。<sup>22</sup>

理學家將為濟王申冤一事視作關係人倫綱常的大事，也得到不屬於理學陣營的新進官員認同。大理寺評事胡夢昱在七月提出長達3,000餘字的奏書，進一步闡發真德秀的論點。胡夢昱首先強調宋太祖傳弟而不傳子的決定為超越前古之舉，可見「友愛之義」為宋立國之根本。但是，在宋代並非沒有發生過兄弟相爭的前例，太宗對秦王廷美的處置就是一個範例。夢昱強調太宗雖因秦王圖謀君位而加以懲罰，但在秦王死後，追封、賜謚、恤孤等事相繼舉行，顯示太宗「友愛之義未嘗終絕」，理宗對待濟王，應以太宗為法：

臣竊以為，君臣之分不可暫僭，則駁之者，乃臣下之職守也；兄弟之情不可終絕，則排羣議而無反汗焉，乃陛下之恩意也。……今臣下既聲濟邸之過，陛下則從而宥其過；臣下欲奪濟邸之恩，陛下則從而厚其恩。君臣之責，庶兩盡矣。奈何駁

<sup>21</sup> 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4，〈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一〉，頁11-16。

<sup>22</sup> 脫脫等編，《宋史》，卷430，〈道學四·李燾傳〉，頁12784。

議一聞，恩命竟寢，則是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終於絕矣。

戕天理，斁人倫，我宋立國之根本，傷損多矣。<sup>23</sup>

胡夢昱認為官員要求追究濟王僭越的罪過是盡臣子之責，但理宗應堅持給予濟王恩賜，才是身為君王應有的本分。如果因官員的反對而收回成命，將導致兄弟人倫斷絕，進而損害宋室賴以立國的道德基礎。若濟王含冤未雪，其冤氣鬱積不散，更將上訴於天而帶來災禍：

臣又聞聖明在上，天下無冤民。乃若至親骨肉之間，冤抑且不能以自伸，未有不召變、稔禍者。晉之恭世子本無置毒之事也，驪姬則以置毒誣之，懼而出奔，甘於自縊。晉獻公卒不之察，亦無有為之辯明者，父子之天終不回焉。異時出而為祟，狐突親見而與語焉，所謂請於帝以聲冤，託於秦以伐罪者，若怪也。

晉之禍，卒如其言者，何也？冤抑之氣，鬱而不散故也。<sup>24</sup>

胡夢昱以春秋時晉獻公(?-651 B.C.)之子申生(?-656 B.C.)含冤而死，向上帝訴冤，借秦國之力製造晉國災禍的前例，對理宗提出警告：濟王之冤氣在未來將為國家帶來禍亂。這樣的說法，立即引發兩極化的反應。支持其立場的文臣讚美他「訐直無忌」，或說「胡公之論痛快，使人讀之流涕」。<sup>25</sup>親史彌遠的官員則說這篇上奏「皆其憤詈咒詛之語」，認為夢昱指濟王含冤將為祟的說法是詛咒理宗，要求予以嚴懲。<sup>26</sup>雙方陣營的對立因此更形激烈。

對同情濟王的官員而言，理宗堅拒給予趙竑追贈，令人難以理解。

<sup>23</sup> 胡知柔編，《象臺首末》，卷1，〈寶慶乙酉詔求直言八月二十二日應詔上封事〉，頁2。

<sup>24</sup> 胡知柔編，《象臺首末》，卷1，〈寶慶乙酉詔求直言八月二十二日應詔上封事〉，頁2。

<sup>25</sup> 周密著，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卷14，〈巴陵本末〉，頁253；陳宓，《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11，〈回真西山書〉，頁30。

<sup>26</sup> 胡知柔編，《象臺首末》，卷1，〈監察御史李知孝章疏〉，頁8-9。

因為不僅北宋太宗對於涉嫌「謀反」的秦王廷美早有追贈王爵，恢復其子官爵的前例；<sup>27</sup>宋代以前的王朝，捲入皇位之爭而死的宗室成員，也經常得到追贈與立後的待遇，以示對骨肉親情的尊重。像是漢文帝時淮南王劉長被指為謀反，遭貶至蜀，在途中絕食而死。文帝為避免殺弟的指責，下令封其四子侯爵；數年後又追封劉長為厲王，以其三子分封淮南王故地。<sup>28</sup>唐代李世民(598-649, 626-649 在位)對於親兄弟李建成(589-626)、李元吉(603-626)的處置更有極大的轉變。武德九年(626)玄武門之變爆發，李世民先誅殺建成與元吉，再將二人遺留的子嗣共計10人全數處死。但李世民登上帝位後，追封建成為息王，元吉為海陵郡王，以禮改葬。後來又分別指定自己的兒子趙王福(634-670)與曹王明(?-682)為建成與元吉之後嗣。<sup>29</sup>顯然，對勝利的一方而言，君臣名分既定，以骨肉親情為由，恢復死者的官爵並指定後嗣，既無損已得之權位，又可以顯示君主的寬大，減少弑親的批判。朱熹弟子陳宓(1171-1230)致書真德秀，就從這個角度來批評當時的執政者：

褒贈一事既不能救於前，今崇虛文，用紓天下之憤。此昔人雖至愚詐者，猶且託之，以掩其惡。今人及以為不可，豈不大可駭！區區虛文猶不能聽，則實事有大於此者，可知矣。<sup>30</sup>

追贈死者官爵不會改變既成之事實，反而可藉此名義平息眾怒，這種前代君主常用的作法卻不被採行，顯示執政者師心自用，完全不能容納異議。顯然，在陳宓看來，史彌遠既已逼死趙竑，在其身故後為了平息眾怒，應該參照歷史上的前例，給予追贈。值得注意的是，陳宓

<sup>27</sup>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5，雍熙元年正月，頁572；脫脫等編，《宋史》，卷244，〈宗室·魏王廷美〉，頁8670-8671。

<sup>28</sup> 班固，《漢書》，卷44，〈淮南衡山濟北王傳〉，頁2141-2144。

<sup>29</sup> 劉昫等編，《舊唐書》，卷64，〈高祖二十二子列傳〉，頁2419、2422-2423。

<sup>30</sup> 陳宓，《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11，〈回真西山書〉，頁28-29。

雖稱褒贈濟王為「虛文」，但他顯然十分看重追贈一事所代表的意義。事實上，要求理宗追贈濟王的官員皆認為此事關係「綱常」，而「綱常」則是立國的基礎。因此，追贈或許可稱為「虛文」，卻是關係重大。

從史彌遠的角度來看，當初逼死濟王，就是要避免有人利用其名義來挑戰理宗的皇位，如果加以追贈，又為其立後，等於重新製造可能威脅皇權的勢力，當初逼死趙竑便不再有意義。因此，史彌遠以「不當為之後，以貽它日憂」為由，回絕為濟王立後的要求。<sup>31</sup>從史彌遠及其支持者的反應看來，他們同樣看重追贈官爵與立後嗣所代表的意義，且認定這些舉措將會導致未來政局的不穩。因此，史彌遠等人不可能將真德秀等人的主張視為一種平息眾怒的權宜手段。相反地，親史彌遠官員一再上奏理宗，要求對趙竑「正名定罪」，<sup>32</sup>就是為了強化史彌遠在處置趙竑一事上的合理性；指斥真德秀等人的說法是「舛論綱常」，也是不讓理學家獨佔道德詮釋的話語權，要在合理性的議題上與真德秀等人一爭高下。<sup>33</sup>由此看來，追贈趙竑直接關係著爭議雙方立場的正當性，也正由於雙方都重視「名分」，視之為無法讓步的道德原則，對立與衝突乃無法避免。

為了宣示同情濟王官員的言論失當，在理宗與臺諫官的支持下，史彌遠從寶慶元年八月開始逐步將持異議者貶官、免職。擁有較高聲望的理學家如真德秀、魏了翁受禍尚輕，但不屬於理學陣營的胡夢昱與其上司大理少卿徐瑄就遭到嚴厲的懲罰，數年之後，雙雙死於嶺南

<sup>31</sup> 參見脫脫等編，《宋史》，卷434，〈儒林楊泰之傳〉，頁12901。

<sup>32</sup> 理宗在寶慶二年給執政官員的詔書就提到：「臺諫屢乞正名、定罪，論奏不已，私情公議未知適從。」見不著撰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31，寶慶二年五月，頁12。

<sup>33</sup> 不著撰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31，寶慶元年八月，頁8。

的貶所。<sup>34</sup>但是，此種不幸的遭遇反而增加這批逐臣的聲望。胡夢昱原本聲名不顯、官位不高，在被貶之後被譽為「小澹庵」，與高宗朝上奏要求處斬秦檜(1090-1155)的胡銓(1102-1180)齊名，得到許多士人的同情和支持。<sup>35</sup>

當反對者因政治力的打壓而得到廣泛的同情，史彌遠更努力於合理化自己的作為。臺諫官在打擊真德秀等人之餘，持續論奏趙竑的罪過，要求正式給予處分，卻一直得不到理宗同意。到了寶慶二年(1226)五月，李知孝再度上奏，要求「速正濟王叛逆之罪，追奪王爵」，並對理宗說：「陛下篤親睦族可謂至矣，臺諫、給舍既屢奏諫，若有施行亦非不得已，願早賜睿斷。」認為在官員的持續要求下，理宗可以將處分趙竑視為「情非不得已」的決定；也就是在暗示，官員的持續上奏已製造了適當的條件，可以讓國君在展現友愛之情與伸張國法間取得平衡。在此情況下，理宗終於要求執政官員研議正式公布趙竑的罪狀。<sup>36</sup>當年七月，史彌遠等官員引用北宋太宗處理秦王的前例，提出具體的懲處建議：

竊詳秦王以言語不順，尚坐追降、竄責。今濟王逆節著明，負先帝教育之大恩，忘陛下友愛之至德，參之公論，揆之國法，死有餘罪。臣等仰體宸旨，詳議審處，欲乞將濟王追降巴陵縣公，庶幾上全仁恩，下伸公議。<sup>37</sup>

史彌遠堅持將趙竑的爵位由「王」降為「縣公」，其目的在於詔告全

<sup>34</sup> 史彌遠對真德秀等人的打壓，參見方震華，〈轉機的錯失〉，頁 21-25。

<sup>35</sup> 不著撰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 31，寶慶二年三月，頁 10；周密，《齊東野語》，卷 14，〈巴陵本末〉，頁 253-254；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 6，〈象郡送行詩〉，頁 100-101。

<sup>36</sup> 不著撰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 31，寶慶二年五月，頁 12。

<sup>37</sup> 不著撰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 31，寶慶二年八月，頁 13。

國，趙竑是「逆節著明」、「死有餘罪」，以君主之名宣示逼死趙竑的正當性。當理宗批准了此一提議，史彌遠的訴求獲得全面的勝利，一年多來的激烈爭議乃暫告段落。但是，主政者的強制打壓並不能消滅反對意見，為趙竑訴冤的呼聲仍間歇性的出現，<sup>38</sup>並在史彌遠死後形成新的政治風潮。

### 三、不安的君主

因濟王引發的爭議，在紹定六年(1233)十月史彌遠去世後進入新的階段。理宗親政後，立即徵召因論濟王而被貶降的官員入朝，對於已亡故者則給予贈官，協助其歸葬故里。這些平反的作為使得胡夢昱等人的名望與影響更為擴大。像是由洪咨夔(1176-1236)撰寫的胡夢昱贈官〈告詞〉，於端平三年(1236)由知吉水縣陳元普刊刻公布於當地縣學，並將胡夢昱列為縣學崇祀者之一。陳元普撰寫的〈吉水縣刊告詞跋〉，提到他上任後發現，吉水縣雖為胡夢昱的故鄉，但在縣學中並沒有祭祀夢昱的牌位，於是「大懼無以揚忠烈、表士則」，乃刊刻相關文件於縣學之中。<sup>39</sup>此種由地方官自行發起的推崇胡夢昱作為，代表同情濟王的力量，向更廣泛的士人群體擴散。

隨著同情濟王的官員重新擁有發言權，他們開始針對史彌遠及其黨羽進行批判，希望理宗能一改史彌遠的作為。例如魏了翁在接到理宗於端平元年(1234)正月所下的求言詔書後，進呈封事，列舉十事來批判史彌遠長期執政所造成的各種政治、軍事弊端，其中並不包括為濟王立後，而是在最後的〈貼黃〉中說：

往歲臣嘗以狂瞽野言告於陛下，不謂諸臣繼亦有言，凡皆出於

<sup>38</sup> 參見方震華，〈轉機的錯失〉，頁 21-25。

<sup>39</sup> 胡知柔編，《象臺首末》，卷 2，〈吉水縣刊告詞跋〉，頁 19-20。

愛君憂國之同然，非可以強合者。而當時言者朱端常、莫澤、李知孝、梁成大諸人乃以此間君臣之合，疏骨肉之親，臣雖獨遭重譴，不復自辨，以羞當世之士。臣今幸而生返，尚不知懲創，欲為陛下終言之，又慮人心所同，一開其端，言者不已，益重臣過。故臣不敢復言，惟望陛下檢照前後臣寮文字，斷自聖心。<sup>40</sup>

顯然，濟王案為史彌遠執政期間最具爭議的事件，魏了翁不願特別突顯此事，以免在當時內、外情勢交迫的環境中，引發官員上書的風潮。但他仍希望君主能採納當年的建言，對濟王之冤有所處理。問題是，理宗重新起用同情濟王的官員，只是想消弭史彌遠強勢打壓所造成的政爭，並不是真的要全面改變之前的作法，雙方的期待顯然有很大的落差。

因此，理宗並無意接受魏了翁等人的建議，他特別下御筆「保全」史彌遠的後人，並要求官員不得批判彌遠身前的作為。<sup>41</sup>對於濟王的處理，理宗在端平元年五月下詔：

故巴陵縣公竑脅於狂寇，不能固拒，遂陷於逆，朕甚痛之。今一新政化，加惠存歿，可盡復其本身官爵，仍令有司其檢祇塋所，以時致祭。其立嗣一節，關係國家，難以輕議，朕不敢私。<sup>42</sup>

在定位趙竑為「叛逆」的前提下，以追復官爵作為君主個人授予的特殊恩典，也是宣示政局一新的象徵。至於為其立後嗣，理宗認為事關重大，並不在為君者「私恩」的範圍，等於明白拒絕此一提議。這樣的作法顯然不為同情濟王的官員接受，洪咨夔、鄭逢辰(?-1248)、韓祥等

<sup>40</sup>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 18，〈應詔封事〉，頁 1-29。

<sup>41</sup>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 20，〈奏乞收回保全故相史彌遠御筆〉，頁 10-12。

<sup>42</sup> 不著撰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 32，端平元年五月，頁 13-14。

人仍持續要求為濟王立後。<sup>43</sup>

理宗對當時為濟王訴冤的言論頗不以為然，他在端平二年(1235)對劉克莊(1187-1269)直率的表示：「濟王之事與秦王不同，群臣引秦王為比，非也。」劉克莊對此的回應是：

畢竟陛下本心不如此。震悼、輟朝，陛下本心也；討論贈典，陛下之初詔也。彼來因一等小人為給舍、臺諫，繳駁論列不已，遂有後面一段施行。臣謂當治此一等小人之罪，以滌陛下千載之謗。<sup>44</sup>

強調理宗在趙竑死後立即輟朝，並給予追贈，後來追降爵位，全是「小人」之過，應懲處當初追究濟王罪過的官員，以釐清責任。但是，理宗答以：「人主尚恩，有司守法。」認為當初反對追贈濟王的官員，只是在堅守國家應有的法度，顯然不同意劉克莊的說法。<sup>45</sup>由此可見，理宗並無意與批判濟王的官員劃清界限，也不追究其責任，這種立場引發更為激烈的批判。要求理宗明白宣示史彌遠等人罪狀的論點，可以張端義(1179-?)為代表：

陛下友愛之道天下孰不知之，……彌遠不顧陛下天顯之念，持論過慘，用法過苛。……陛下欲洗萬世之謗，以全敬兄之道，當復濟王茅土之封，為建家廟以奉特祀，就以彌遠之第賜之，使天下知濟王之毀折，非陛下之心，是彌遠欲削其跡也。陛下欲慰寧考在天之靈，當從陛下服居親近中，擇緊德素著、昭穆相當者一人繼濟王後，使天下知濟嗣之未立，非陛下之心，是

43 脫脫等編，《宋史》，卷406，〈洪咨夔傳〉，頁12267；周密，《齊東野語》，卷14，〈巴陵本末〉，頁256-257。

44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51，〈錄聖語申時政記所狀〉，頁1343。

45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51，〈錄聖語申時政記所狀〉，頁1343。



彌遠欲絕其後也。……使九原有知，濟王必不為若敖之鬼矣。<sup>46</sup>  
 為避免濟王的鬼魂為厲，張端義主張理宗應詔告天下，自己的本意是要追封濟王，完全是因史彌遠的阻攔才引發後來的爭議，故一切對於濟王的打壓皆應歸責彌遠。因此他要求朝廷將史彌遠故宅改為濟王的家廟，並選擇宗室為其後嗣，以宣誓造成濟王絕後的是史彌遠，而非理宗。但是，張端義如此激烈批判史彌遠的結果，卻是被貶官廣東。<sup>47</sup>

理宗君臣之間因史彌遠而引起的對立，並不僅止於上述用詞尖銳的奏書。力主為濟王立後的王邁曾與理宗有激烈的言語交鋒：

為正字日，因輪對，及故相擅權。理宗宣諭曰：「姑置衛王之事。」邁即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邁後歸鄉里，自稱「勅賜狂生」。<sup>48</sup>

理宗先要求王邁停止批判被封為衛王的史彌遠，接著被王邁的直言激怒，徑自中斷輪對而去，王邁則對被君主斥為「狂生」感到自豪。反映出當時反對者的情緒高張，不惜與君主正面衝突，理宗雖擁有皇權，仍無法制止此種行為。

理宗不願採納前述官員的意見，可能是因為當年史彌遠摒棄趙竑而擁立自己，否定史彌遠的作為等同於損害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提出訴求的官員也開始意識到，為濟王立後與理宗沒有子嗣一事相互糾結，使問題變得複雜。在自己沒明確繼承人的情況下，理宗擔心為濟王指定後嗣，將導致有人藉此為亂；若僅以濟王含冤未雪作為訴求，顯然不易成功。方大琮(1183-1247)於是試著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sup>46</sup> 鄭真輯，《四明文獻》，卷上，〈史彌遠〉，頁12-13。

<sup>47</sup> 李昉英著，楊芷華點校，《文溪存稿》，卷5，〈題節推張端義荃翁集〉，頁62；卷16，〈送荃翁張端義之惠陽并序〉，頁174。

<sup>48</sup> 周密，《齊東野語》，卷4，〈潘庭堅王實之〉，頁70。

服理宗：「或曰：『皇嗣未衍，未遽議也。』不知〈麟趾〉不歌，何以致〈螽斯〉之盛事？」<sup>49</sup>引用《詩經》中〈麟之趾〉與〈螽斯〉兩篇來反駁在理宗未得皇子前，不應議論為濟王立後一事的說法。他主張理宗如果不能做到「麟之趾，振振公子」，便難以期待會有「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的結果。<sup>50</sup>也就是說，理宗若想子孫繁盛，必須先敦睦自己的兄弟，為濟王立後。劉克莊在端平二年輪對時，提出更具折衷性的建議。他認為理宗之所以不願為濟王立後，是「以國本未立也」。他建議理宗公開宣示未來一旦太子人選確定，即為濟王選立後嗣：「他日陛下子孫千億，國本既建，此事恐不容已，不若令天下人先知此意。」也就是說，為濟王立後既無從迴避，不如儘早宣布此一意願，只要理宗公開宣示為濟王立後的意願，實際的執行則可等到太子人選確定之後，以避免產生皇位繼承的爭議。但是，理宗沈默不語，顯然並不認同劉克莊的說法，也不肯讓步。<sup>51</sup>

從理宗對官員的回應來看，要求為趙竑立後的聲浪固然高張，對理宗未能產生什麼影響，他堅拒相關的提議，並試圖鼓動相反的論點。嘉熙元年(1237)，京城發生大火，理宗為此下詔求言，官員、士人紛紛主張濟王含冤未雪是導致火災的原因。<sup>52</sup>但有二人上書提出異議：

<sup>49</sup> 方大琮，《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1，〈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一劄〉，頁7。

<sup>50</sup> 《毛詩正義》，卷1-1，〈螽斯〉、〈麟之趾〉，頁93、119。

<sup>51</sup>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51，〈論對劄子〉、〈錄聖語申時政記所狀〉，頁1337、1343。王邁在端平二年也提出類似的主張，他認為當時的「天怒民怨」皆是濟王為厲，要求理宗：「命有司以禮改葬，以妥其神，乃俟國本既定，然後為之立嗣。」此一建議也未被採納。見王邁，《驪軒集》，卷2，〈乙未閏七月輪對第二劄〉，頁22。

<sup>52</sup> 當時上書的官員包括史彌鞏、趙必愿、趙琳、劉克莊、王邁、方大琮、潘枋等人，官學的學生也聯名上書，參見脫脫等編，《宋史》，卷423，〈史彌鞏傳〉，頁12637；卷413，〈趙必愿傳〉，頁12410；卷423，〈王邁

獨府學生李道子立異一書，援唐立武后事，謂此陛下家事，勿恤人言。又有廣南額外攝官事鄒雲一書，尤為可駭。大略謂：「濟邸不能一死，受程軍、陳登之徒，班廷拜舞於倉猝之際，天日開明，著身無地，夫復何言。今天下之士，反起興憐，陛下又從而加惠之，復其爵位，給其帑藏，可謂曲盡其恩。今天下之士，不知大義所在，復以立嗣為言，簧鼓天下之聽。且濟邸雖未得罪於天下，而實得罪於《春秋》，濟王不道，法所當除。陛下尚軫在原，猶存爵位，借使勉從群議，俾延於世，不可也。矧當世情多阻之時，人心趨亂者眾，萬一貪夫不靖之徒，有以立楚懷王孫而激亂者，是時置國家於何地，其亦不思之甚矣。以真德秀之賢，猶且昧此，況他人乎？」二人並特旨補將仕郎，權夕郎丁伯桂駁之，乃止。<sup>53</sup>

引用唐高宗(628-683, 649-683 在位)立武則天(624-705, 690-705 在位)的前例，主張皇室內部的事務，根本不須理會外朝官員的意見。甚至認為濟王確實接受反叛者的擁立，將其處死，並無不當，現在若為其立後嗣，只會為有心人製造叛亂的藉口。何況當時南宋正面臨外患侵逼，人心思亂，更不應接受此種意見。從理宗立即降下特旨，授予二人官位看來，顯然十分讚賞此種說法，顯示理宗擔心為濟王立嗣不僅會為日後的皇位繼承種下爭議，更可能立即引發政治騷亂。只是這兩位擁護君主的上書者地位不高，難以與眾多朝臣匹敵，理宗給予的獎勵很快即因丁伯桂(1171-1237)、方大琮等官員的封駁而撤回。<sup>54</sup>

傳》，頁 12635-12636；卷 425，〈潘耒傳〉，頁 12671。周密，《齊東野語》，卷 14，〈巴陵本末〉，頁 257。佚名，王瑞來箋證，《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卷 1，嘉熙元年六月，頁 99。

<sup>53</sup> 周密，《齊東野語》，卷 14，〈巴陵本末〉，頁 257。

<sup>54</sup> 方大琮批評李子道和鄒雲從的行為是「寔人寒士揣摩以希必合，恐喝以觀

理宗堅拒為濟王立後，使得君主與臣僚間的緊張關係無法化解。面對拒絕讓步的皇權，抗議者不斷訴諸天意與災異。因此，每當天災或異象產生，官員、士人即以濟王訴冤於上帝，或冤氣不散導致災害為由，上書要求為濟王立後。理宗對此頗不以為然，曾在經筵時，向朱熹的弟子葉味道提問，認為經書中記載春秋時晉國伯有(?-543 B.C.)死後為厲之事，恐怕是荒誕不經之說。葉味道明白理宗的用意，因而回答：

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於是為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sup>55</sup>

可見，朱熹一派的理學家以氣的聚散，論證冤死者的鬼魂可使國家陷於不安的傳統說法。若死者其氣不散，則將造成妖厲，必須為其立後嗣，以使死者安息。在朱子學盛行的時代，此種看法顯然居於主流地位。

為濟王鳴冤的文官、士人，也對「天意」能影響國運堅信不移。寶慶元年因上書論濟王事而被罷去官職的洪咨夔，於端平三年去世前所上的〈遺表〉中對理宗說：「臣竊謂今日內訌、外阻之勢已成，根深蒂固之計安出？殆非人力之及，尚幸天心之回。」主張「回天意」為施政的第一要務。接下來他要求理宗做到「至敬無邪」、「至公無私」等事，即藉端正自己的道德以求挽回天心。最後又說自己死後，「魂氣有知，猶當上訴于帝：蒙韃不可為中原主，必佑助于有德。猶

---

必聽。」又說：「豈有通國皆誤陛下，而二人獨為愛歟？」見方大琮，《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3，〈繳奏御筆李子道鄒雲從應詔論事文理可采並特補將仕郎錄黃〉，頁5-9。

<sup>55</sup> 脫脫等編，《宋史》，卷438，〈儒林·葉味道傳〉，頁12986。

是微臣區區報主之職分也」。<sup>56</sup>生命結束之後無法再為國政盡力，但仍寄望能向上天爭取，以阻止蒙古入主中原而庇佑宋室。由此看來，「挽回天意」的說法並非只是在現實上為了對抗皇權而產生，當時人確實相信天意對於人間事務具有實質的影響力。當時若有人提出相反的論點，即被指為奸邪，方大琮就說：

自夫論事而不論理，計利害而不計是非，設為危險之言，陰肆脅持之術，其始皆左右儉人耳。今搢紳大夫或有從而和之，若天人不相關，而內外不相為謀者。聖賢救世之防，始決於此，豈不可懼？世豈有理外之事，是非外之利害哉！<sup>57</sup>

主張現實的利害必須根基於道德的是非，只有小人才會認為天理與人事無關，內在道德對於外在事務沒有影響。方大琮強調，小人提出這種主張，將會破壞聖人所堅持的救世原則，而令人感到畏懼。

在此情況下，認同理宗的立場，指災異之說為虛妄的官員備受輿論的批判。嘉熙元年，侍御史蔣峴曾上書駁斥主張濟王冤魂為厲，以致京城大火的说法：

殿院蔣峴伯見謂：「火災止是失備，更無餘說。」且云：「濟邸之於陛下，本非同氣之親，非兄弟而強為兄弟。」又云：「《中庸》達道，始於君臣而次於父子；大易二篇，基於父子而成於君臣，而況下於父子者乎？此見君臣之道，獨立於天地之間。」又云：「君臣既定，父子不必言，兄弟不當問。」又云：「天不能命，神不能語，巫而誣焉。」於是太、武學生劉實甫等二百餘人，相率上書力攻之，峴遂罷言職。<sup>58</sup>

<sup>56</sup> 洪咨夔，《平齋文集》，卷 13，〈遺表〉，頁 96-97。

<sup>57</sup> 方大琮，《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 3，〈繳奏御筆李子道鄒雲從應詔論事文理可采並特補將仕郎錄黃〉，頁 7。

<sup>58</sup> 周密，《齊東野語》，卷 14，〈巴陵本末〉，頁 257-258。

蔣峴認為火災的發生只是由於人為的疏失，並非上天降禍，自不可據以論述「天意」。他認為上天不會降下命令，鬼神也不能發言，因此為濟王訴冤的言論，全是假借天意與鬼神的誣枉之言。他更力主君臣名分的權威超越父子、兄弟之倫，並完全否定理宗與趙竑之間的兄弟關係。這種絕對維護皇權的說法，背離當時士人所認知的倫常與天人觀念，遂引發眾怒而被迫去職。

由於深信冤氣為厲，任何災異、事變的發生，都可以被解釋成濟王含冤所致。因此，蒙古軍在理宗親政後不斷入侵，也被認為與此有關。例如方大琮在請求為濟王立後的奏書中說：

通天地間一氣耳。今也盤氣流行，在天則為妖星，在地則為洚水，在朝廷則為二相不成，在邊方則為諸閭不協。去歲叛兵之變，自南而北，殆遍天下；去夏殿旅之闕，市廛晝閉，相恐以走，此無非盤氣之流注、激射也。……昔鄭人驚伯有之厲，子產以為鬼無歸之故，或者類是。……先儒嘗謂夷狄為患，由中國先無三綱。故臣以綱常為弭亂之本，又謂一念覺處便是天理，故臣以一念為綱常之本，然則宗社存亡之決，夷狄嚮背之機，天命、人心去留之會，在陛下今日之一念。<sup>59</sup>

從氣論的角度，將端平年間的各種問題：天象變異、水災、兵亂以及中央與地方官員的權力鬥爭，皆歸咎於「盤氣流行」，即天地間充滿暴戾之氣。根本原因在於濟王含冤，魂魄沒有歸宿，甚至蒙古的入侵也是南宋綱常不立所產生的結果。因此，在方大琮看來，當前各種困境的解決之法，都繫於適當地處理兄弟人倫，這全在理宗一念之間。

由此可見，當時為濟王訴冤的說法，不論綱常、天意、災異或冤

---

<sup>59</sup> 方大琮，《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1，〈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一劄〉，頁7-8。

死者為厲，都是根基於宋代以前早已存在的概念，理宗、史彌遠及其支持者，都難以提出有效的論述予以反駁。現代學者曾引用理學家對「道理最大」一語的闡釋，論證在北宋出現「天變不足畏」思想後，災異、天變不足以抗衡君權，宋代文士企圖藉著「道理」的權威性來約束君權的濫用。<sup>60</sup>事實上，從濟王案來觀察，「天變不足畏」說法的影響力甚微，以真德秀、魏了翁為首的理學家，也沒有使用「道」或「理」作為對抗君主的依據，而是訴諸傳統的綱常、天意等理念，這一點可能正是他們的訴求得到廣泛支持的原因。理宗親政之後，藉著災異、外患來為濟王訴冤的官員、士人眾多，早已超出理學團體的範疇，也使得抗議的聲浪歷時長久，延綿不絕。

在此情況下，理宗雖能憑藉著皇權，堅拒為濟王立後，卻無力阻止群臣議論此事。更由於理宗一直無法養育出成年的皇子，皇位繼承人選長期懸而未定，臣僚在議論此事時，往往觸及理宗即位時的爭議，令他十分難堪。例如：趙葵(1186-1266)在淳祐年間建議理宗儘速收養宗室作為儲君，並說：「如陛下即位，便不是好樣子。」因而被譽為「尤人所難言也」。<sup>61</sup>趙葵在理宗朝出將入相，備受倚重，大概因此而直言無忌。<sup>62</sup>言詞同樣直率的還有吳潛(1196-1262)。吳潛是理學家吳柔勝(1154-1224)之子，在端平元年曾上書要求理宗雪濟王之冤，認為「數年以來，火盜並興，水旱交作，夷狄內訌，未必上帝之意、祖宗之靈不以此介介也」。<sup>63</sup>視處理此事為當時的要務。等到開慶元年(1259)擔

<sup>60</sup> 葛兆光，〈回到歷史場景——以宋代兩個關鍵詞為例談哲學史與思想史的分野〉，頁 169。葛兆光，〈洛陽與汴梁——文化重心與政治重心的分離——關於十一世紀 80 年代理學歷史與思想的考察〉，頁 28-30。

<sup>61</sup> 劉一清，〈錢塘遺事〉，卷 3，〈趙信庵〉，頁 1。

<sup>62</sup> 關於趙葵的生平參見方震華，〈軍務與儒業的矛盾——衡山趙氏與晚宋統兵文官家族〉，頁 10-31。

<sup>63</sup> 吳潛，〈許國公奏議〉，卷 1，〈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

任右丞相後，又因立太子一事與理宗發生衝突。理宗在寶祐元年(1253)以親姪趙禔(1240-1274，1264-1274在位，即度宗)為皇子，次年進封為忠王。<sup>64</sup>景定元年(1260)理宗策立忠王為皇太子，吳潛提出異議，對理宗說：「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sup>65</sup>直接觸及理宗為史彌遠所擁立的歷史，令理宗十分不滿。這一類臣僚的言詞與態度顯然有損君主權威，令理宗感到不安，部分官員意識到這一點，便試圖藉此議題來謀取理宗的信任和支持。

史彌遠的姪子史嵩之(1189-1256)，以及協助彌遠擁立理宗的鄭清之，都致力於化解理宗因濟王事件所感受到的不安。史嵩之為相期間，正值嘉熙元年朝野人士為濟王訴冤的高峰，嵩之以李大同與蔣峴為諫官，打擊上書言事者。劉克莊、王邁、方大琮、潘枋(1205-1246)皆因此而貶官。<sup>66</sup>大理司直程公許為此上書理宗：

羣臣忠告者眾，而聖意確不可回；聖意不可回，而言者不免於激。陛下宜以大舜無藏怒宿怨為心，而參酌於漢文帝之待淮南厲王、我太宗待秦邸之故事，以召和氣，弭眚災，特在一念轉移之頃耳。<sup>67</sup>

主張理宗應包容官員的激烈言論，因為言論的激化是理宗一再拒絕為

事》，頁 21。

<sup>64</sup> 脫脫等編，《宋史》，卷 43，〈理宗本紀三〉，頁 847；卷 44，〈理宗本紀四〉，頁 853。

<sup>65</sup> 脫脫等編，《宋史》，卷 418，〈吳潛傳〉，頁 12519。

<sup>66</sup> 蔣峴和李大同劾奏為濟王訴冤者，相關的記載頗多，可參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151，〈鐵菴方閣學墓誌銘〉，頁 3882-3883；脫脫等編，《宋史》，卷 423，〈王邁傳〉，頁 12635-12636；卷 425，〈潘枋傳〉，頁 12671；佚名，王瑞來箋證，《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卷 1，嘉熙元年六月，頁 99。

<sup>67</sup> 脫脫等編，《宋史》，卷 415，〈程公許傳〉，頁 12455。



濟王立後的必然結果。可見支持為濟王立後的官員眾多，蔣峴的打壓仍不足以使反對者噤聲。程公許隨後又遭蔣峴彈劾罷官，校書郎徐元杰(1194-1245)因不滿蔣峴一再彈劾主張為濟王立後的官員，乃一再求去。<sup>68</sup>到了淳祐二年(1242)，史官高斯得(1201-?)、杜範(1182-1245)等人完成《四朝帝紀》的編纂，史嵩之特別針對〈寧宗紀〉中與理宗、濟王相關的記載進行修改，因而引發激烈的反彈，杜範甚至以「姦人勦入邪說」來指責嵩之的行為，但仍舊無法改變史書內容被篡改的事實。<sup>69</sup>史嵩之的作為顯然是為了討好理宗，故史官們如何抗議仍無濟於事。如此一來，史嵩之在官僚群中樹敵甚多，到了淳祐四年(1244)時，史嵩之丁父憂去官，理宗下令嵩之起復視事，引發眾多文官與官學學生的激烈反對。同情濟王的官員，如徐元杰、韓祥、劉克莊都是當時激烈的批判者，最終迫使理宗收回成命，史嵩之的政治生涯也因此告終。<sup>70</sup>

鄭清之在淳祐十年(1250)為相時，進呈《潛邸聖語》一卷，記述他所參與的理宗即位過程，並請求交付史館。理宗在閱讀後，又親自加上批注，記錄嘉定十五年(1222)進士唱名時，楊皇后特別指示宦官傳旨，要自己站在垂簾之前，楊皇后在簾後觀看良久，可見當時已屬意自己繼位。<sup>71</sup>君臣雙方顯然都想藉著重述當年即位的過程，強化自己的權位。鄭清之又上奏，請求將史彌遠配享寧宗。他在奏書中提及，理宗登基實出於史彌遠之助，但當日之實情尚未為國史所收錄，而參與其事者除了自己以外皆已亡故，所以必須出面陳述彌遠之功，因為他擔

<sup>68</sup> 脫脫等編，《宋史》，卷 424，〈徐元杰傳〉，頁 12660。

<sup>69</sup> 脫脫等編，《宋史》，卷 409，〈高斯得傳〉，頁 12323。

<sup>70</sup> 周密著，周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別集下，〈史嵩之始末〉，頁 288；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80，〈奏乞坐下史嵩之致仕罪名狀〉，頁 2119-2121。

<sup>71</sup> 方回，《桐江集》，卷 4，〈鄭清之所進聖語攷一〉，頁 595-597；〈鄭清之所進聖語攷三〉，頁 608-609。

心「不早辯之，則異日使巴陵之邪黨，復祖紹聖之故智，變亂白黑，巧飾異論，如邢恕輩覆出為虐，我國家豈堪再壞耶！」<sup>72</sup>在鄭清之上奏之時，理宗已在位 26 年。但清之對「巴陵邪黨」仍十分猜忌，並引用北宋邢恕等人假稱宣仁太后(1032-1093)有廢立哲宗(1077-1100, 1085-1100 在位)之意，藉以打擊元祐諸臣的前例，認為理宗應透過將史彌遠配享寧宗，以公開宣示其擁立之功，避免日後有人顛倒是非。<sup>73</sup>理宗隨後於淳祐十二年(1252)公布御製〈丞相衛王神道碑〉，試圖藉由記述史彌遠的生平，強調自己的即位出於寧宗與楊后之意。在此碑文中，理宗強調自己為皇姪之時參與朝會，寧宗特別予以注目；楊皇后則利用進士唱名的機會，要理宗站立於簾前觀看。由此看來，寧宗與楊后都有意以理宗為繼承人。<sup>74</sup>這些作法都可看出理宗與親近的臣僚擔心同情濟王的聲浪，意圖藉敘述理宗即位的過程來強化其掌權的合理性。但是，當時關於濟王的爭議已聚焦於立後一事，理宗一再強調自己的即位是寧宗的決定，對於化解爭議並無助益。牟子才在鄭清之主政時上書，指當前的情勢與北宋亡國前相似，又要求「為濟王立後，以回天怒」，視解決濟王爭議為挽救國運的契機，就是一個例子。<sup>75</sup>

相對於鄭清之等人藉合理化理宗即位的過程，來謀取主政機會，同情濟王的執政官員則可能因此而受到政敵的攻擊，吳潛在景定元年罷相去職是最好的例子。當時擁護賈似道(1213-1275)的侍御史沈炎以濟王立後一事為藉口，迫使宰相吳潛罷職：

<sup>72</sup> 鄭清之，〈乞將史衛王配享寧宗奏劄〉，收入鄭真輯，《四明文獻》，卷上，〈鄭清之〉，頁 34-36。鄭真記此奏上於淳熙十年(1183)十月，當為淳祐十年之誤。

<sup>73</sup> 有關邢恕之事參脫脫等編，《宋史》，卷 471，〈姦臣邢恕傳〉，頁 13703-13704。

<sup>74</sup> 參見小林晃，〈史彌堅墓誌銘と史彌遠神道碑——南宋四明史氏の伝記史料二種〉，頁 1-17。

<sup>75</sup> 脫脫等編，《宋史》，卷 411，〈牟子才傳〉，頁 12355。

夏四月戊戌朔，侍御史沈炎疏吳潛過失，以「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對館職策，乞為濟邸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奸謀叵測。請速詔賈似道正位鼎軸」。<sup>76</sup>將吳潛有意阻止以忠王為太子，與其拔擢主張為濟王立後的章汝鈞一事加以連結，以此二事作為吳潛不忠於理宗的證據，導致吳潛罷相貶官，由賈似道取代。<sup>77</sup>

#### 四、難回的天意

景定二年(1261)以後，隨著太子人選已定，<sup>78</sup>加上賈似道主政有效穩定政局，為濟王訴冤的聲浪暫歇，但爭議並未解決。景定五年(1264)十月，理宗去世，太子即位，成為度宗，即位的第二天就對濟王一事的處理作出指示，可以看出此事仍具高度的敏感性：

翌日降內批曰：「予惟章聖嗣統之初，復秦王官爵，蓋太宗意而章聖克承之。故濟王生前之官，先皇已自追復；而有未復所贈官爵，乃留以遺後之人；即章聖踐阼，贈秦王太師、中書令之典也。所當繼志，以慰永懷，可追復元贈少師、保靜鎮海軍節度使，仍令所屬討論墳塋之制，目下增修，餘照先帝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指揮。」<sup>79</sup>

<sup>76</sup> 脫脫等編，《宋史》，卷45，〈理宗本紀五〉，頁873。

<sup>77</sup> 章汝鈞是在開慶元年參與館職的考試，以「以厚人倫，扶國綱為對」，被任命為秘書省正字。參見佚名，張富祥點校，《南宋館閣續錄》，卷9，〈官職三·正字〉，頁353；李賢等，《大明一統志》，卷17，〈建平縣〉，頁7b。

<sup>78</sup> 理宗於景定元年四月召賈似道入朝主政，六月，冊立皇子忠王為皇太子，見脫脫等編，《宋史》，卷45，〈理宗本紀五〉，頁873-874。

<sup>79</sup> 不著撰人，《咸淳遺事》，卷上，頁5。

度宗顯然希望以明快的決定，阻止官員藉新君即位的機會議論此事。相對於理宗不願將濟王事件與秦王廷美的前例相提並論，度宗的批文援引真宗(968-1022, 997-1022 在位)追贈廷美官爵的前例，強調恢復濟王官爵為理宗的遺志，可以視為對過去官員訴求的一種讓步。但是，僅追贈官爵及提高墳墓的規制，對立後一事，仍依照端平元年的詔書行事，同情濟王的官員自然不可能滿意。監察御史常楙(?-1282)隨即進言要求為濟王立後，因而觸怒度宗，被外放兩浙轉運使。<sup>80</sup>

理宗與度宗皆不肯在濟王立後一事上有所讓步。他們在位期間，南宋在蒙古的強大軍事壓力下，處境日益艱困，也是難以否認的事實。在此情況下，部分官員顯然相信濟王的冤氣未破，致使天意難回，是導致國運衰頹的重要原因。度宗咸淳九年(1273)初，襄陽城在經過將近5年的激烈攻防後淪陷，宋軍的防線遭到突破，朝野震動，官學的學生紛紛上書，其中郭昌子提出多項具體邊防策略，同時論及濟王之事。<sup>81</sup>顯然，襄陽的失守使當時人增添上天致禍的危機感，濟王議題乃再度被提出。至咸淳十年(1274)七月，度宗去世，幼子即位，由謝太皇太后(1210-1283)垂簾聽政。次年，改年號為德祐，而元朝大軍已渡過長江，常楙乃再度進言：

此亦挽回天意之機。且霅川之事，非其本心，置之死地過矣，不為立後又過矣。匹夫匹婦之冤，猶能召飛霜枯草之災，況嘗備儲闈之選乎？且理宗以來，疆土日蹙，災變日至，毋乃巴陵得請於帝乎？若子產所謂有以歸之，斯可矣。欲乞英斷，為理祖、度考了此一段未為之事，不然，臣恐申生之請未已也。<sup>82</sup>

80 脫脫等編，《宋史》，卷421，〈常楙傳〉，頁12596；徐碩，《至元嘉禾志》，卷13，〈人物〉，頁7469。

81 周密著，周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別集下，〈襄陽始末〉，頁311。

82 周密，《齊東野語》，卷14，〈巴陵本末〉，頁258。

仍然是主張湖州之變非濟王所主導，執政者逼其含冤而死，長久以來冤氣鬱積，致使上天降下災禍，自理宗以來，國勢的日益削弱就是明證，必須對濟王之冤有所處理，否則國家面臨的厄運不會終止。不過，此一建議依舊未得到回應。<sup>83</sup>德祐元年十月，元軍攻破常州，進逼臨安，亡國危機迫在眉睫。中書舍人王應麟(1223-1296)請求將趙昀的封國改為大國，並選擇宗室為其後，以「迎善氣，銷惡運」。在內外龐大的壓力之下，統治者終於接受為趙昀立後的要求。十一月，恭帝下詔追贈趙昀太師、尚書令，陞封鎮王，改謚昭肅，擇宗室為其後，並派王應麟到濟王墓前致祭。<sup>84</sup>應麟在其撰寫的祭文中將趙昀之冤歷時未得昭雪，歸咎於權臣的阻撓；希望藉由追封、立後、修墓等舉措能展現統治者悔過之意：

今強敵憑陵，國步孔棘，氛祲迫於雪川。夙夜兢兢，思所以回上天悔禍之意，用仰成祖宗厚睦之心，贈王師垣端揆，進封大國，錫以令諡，命大宗正選宗屬為王後，賜田萬畝俾奉烝嘗，仍戒有司修崇王墓。英魂如在，歆我卹章，默相陰祐，亟殄強敵，扶持宗社，保乂生民。祖宗在天，寔寵嘉之，王之春秋享祀，亦永永無斁。<sup>85</sup>

強調恭帝力圖挽回天意，期待藉由安撫趙昀在天之靈，以求得其相助，對抗強敵，使國祚永續，而趙昀的享祭也能持續。由此看來，藉由為濟王立後，挽救國運，已成為南宋文臣在面對戰場上連遭挫敗時的最後希望。儘管這種期待終究未能實現，經歷亡國之禍的南宋文人仍然從這個角度來解釋國家的滅亡。

<sup>83</sup> 佚名，王瑞來箋證，《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卷5，德祐元年正月，頁376。

<sup>84</sup> 脫脫等編，《宋史》，卷47，〈瀛國公本紀〉，頁935；卷246，〈室室三·鎮王昀傳〉，頁8737。

<sup>85</sup> 王應麟，《四明文獻集》，卷4，〈祭濟王文〉，頁27。

周密(1232-1298)在入元之後曾詳細記述長達 50 多年的爭議過程，最後提及德祐元年為趙昀追封與立後的舉措，而以：「嗚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作為全篇的結論。<sup>86</sup>他顯然認為統治者最終雖為趙昀立後，想藉此改變天意，但已是時不我予，故未能產生影響，國家隨即滅亡。從濟王的冤屈來解釋南宋的滅亡，在入元的宋人著作中不乏其例。方回(1227-1307)對理宗在親政後的作為有極為嚴厲的批評：

為理宗許者，宜于親政之後，明正[史]彌遠之罪，發棺戮尸，播告天下，謂予嗣大行為之後，天也。以立己為私恩而不討賊，則是無父、無君，而何以永天命，服人心？彌遠之家悉誅，[鄭]清之亦與從坐，如是，則寧考在天之靈可以少慰，濟王將無詞于上帝，祖宗將亦不至于赫怒以降威矣。計不出此，顧以宰臣之位酬姦賞逆，福力盡而沴氣應，哀哉！<sup>87</sup>

認為理宗囿於對史彌遠、鄭清之的私情，不能懲罰二人之罪以伸張公義，反而以宰相之位作為酬庸，這種違背綱常的作法，無法使人心順服，也不能延續天命。濟王乃訴冤於上帝、祖宗，使其震怒而降威，最後造成宋室福盡而災生的悲劇。

因此，在南宋滅亡之後，濟王向上天訴冤，因而引發兵禍的說法仍在流傳。在一個元人記述的故事中，進入臨安城，滅亡南宋的元兵更被描述成濟王復仇的工具：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綿州人也。諱道樞，以齋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謫軍令狀，使無洩。后謂：「昨夜夢濟王大怒，以為吾且將兵，由獨松

<sup>86</sup> 周密，《齊東野語》，卷 14，〈巴陵本末〉，頁 259。

<sup>87</sup> 方回，《桐江集》，卷 4，〈鄭清之所進聖語攷二〉，頁 607-608。

關滅汝社稷。」后特旨令鄧往南高峰頂為謄心章，哀告上帝。已

而，黃頭先鋒斬關吏而入，宋亡，鄧構室吳下曰會通觀。<sup>88</sup>

獨松關是臨安城北面的門戶。德祐元年三月，元廷派遣議和的使者在抵達獨松關時為宋軍所殺，雙方和談的機會因而告終。同年十一月，元軍南下，攻下獨松關，直逼臨安。宰相陳宜中等人不敢再戰，一再派人議和，宋恭帝最終於德祐二年(1276)正月向元軍投降。<sup>89</sup>獨松關一役直接關係宋室的存亡，後人乃將其與濟王的冤死相互關連，將元軍攻入獨松關，詮釋成濟王上訴於天帝的結果。因此，濟王的相關爭議不僅與晚宋 50 多年的政局變化相始終，更在南宋亡國之後，形成了一種歷史詮釋：南宋的滅亡是由於國君在道德上的缺陷，不肯化解濟王的冤屈，造成上天震怒，降下兵禍，國運的衰敗乃無以挽回。

## 五、結論

相對於唐代後期君主的繼承幾乎全為宦官所操縱，宋代文官對於皇位承繼的參與度明顯提高，而南宋幾位皇帝無法養育成年的皇子，必須藉由收養宗室作為繼承人，更增添朝臣介入的空間。寧宗在重病無法上朝前未能策立太子，已埋下紛爭的種子；而史彌遠捨棄早已冊立為皇子的趙竑，改立原為皇姪的趙昀，更引人疑慮。儘管史彌遠憑藉多年來建立的權勢，又取得楊太后的支持，使趙昀繼位的過程十分平順，但終究在日後爆發了擁立失勢皇子趙竑的湖州事變。史彌遠因此逼死趙竑，引發朝臣的反彈，開啟了長達 50 年的爭議。理學家由於重視人倫綱常，又視君主自身的修養為治國的基礎，堅持理宗對趙

<sup>88</sup> 鄭元祐，《遂昌雜錄》，頁 2。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 8，〈鄧山房〉，頁 97。

<sup>89</sup> 李天鳴，《宋元戰史》，頁 1193，1248-1259。

竑之死應展現悔過之心，議論十分激烈。史彌遠陣營則主張正濟王叛逆之名，由理宗公開宣布其過惡，給予身後的懲罰，並指責真德秀等人要求為趙竑追贈、立後的主張是曲解倫常。由於雙方對於自身主張的合理性十分堅持，也自認在道德上擁有正當性，因而難以妥協。史彌遠藉臺諫之力，將反對者貶謫、罷職，雖使爭議暫告緩和，仍無法完全中止異議。

等到史彌遠去世，理宗親政，下令恢復趙竑原有的官爵，並赦免、召回為濟王訴冤的官員，爭議焦點轉移至為趙竑立後一事上。理宗缺乏親生兒子作為繼承人的現實，與此訴求相互糾葛，成為政壇的敏感議題。由於為捲入帝位爭奪而死的宗室立後嗣，在宋代與前朝皆有諸多先例，使得官員們振振有辭。但是，由於相信為濟王立後，將危害日後的皇位繼承，理宗堅拒官員的提議，卻無法為自己的決定找到合理的說詞，讓反對者停止抗議。面對拒絕讓步的君主，中國古代官員常訴諸天意與祖宗，理學家為濟王訴冤時也繼續使用此種訴求。他們認為濟王含冤而死，又無後嗣，導致上天與祖宗之靈的震怒，降下災異。並且以理學對「氣」的解釋，強化「冤氣為厲」的傳統理念，主張濟王的冤氣導致國家面臨各種災禍。理宗親政之後，在蒙古軍持續不停地入侵下，國家的發展面臨諸多困境，致使許多官員深信，不能解決濟王問題是導致災禍不止的原因，進而一再對抗皇權，提出為濟王立後的訴求。

如此一來，理宗的統治就無法擺脫得位不正的陰影，官員以勇於批判君主為榮，致使皇帝的權威受到削弱。由於君臣關係緊張，主持政務的宰相原本是承受皇命，領導官僚，在此環境下卻往往夾在二者之間，最終不能安於其位。史嵩之的去職，就是最好的例子。另一方面，敵對陣營的官員也利用濟王議題以博取君主信任，或藉以攻擊對手，顯示濟王案是導致南宋政局不安的一個重要因素。就結果而言，



朝廷中人事的不穩定削弱了南宋對抗外患的能力，而邊患不止又給予抗議者批判的理由，兩者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

理宗及其繼承人不畏批評，堅拒為趙竑立後，一直撐到亡國危機迫在眉睫，才不得不做出讓步。只是，藉由為趙竑追贈、立後，以挽回天意、消除厄運的希望，很快就隨著恭帝投降，元兵進入臨安而化為烏有。但是，亡國的事實沒有改變當時人認為天意影響國運的信念。相反的，無法化解冤氣以平息天怒，成為入元的南宋士人，經常用以解釋亡國之禍的觀點。由此看來，訴諸天意並非只是南宋士人用以對抗皇權的政治語言，他們對於挽回天意以改變國運的看法深信不疑。這顯示「天意」在南宋政治思想中發揮的影響與意義，以及南宋文士看待「天意」與「人事」的關係，都有待更進一步的探討。

(本文於 2015 年 11 月 18 日收稿；2016 年 3 月 9 日通過刊登)

\*本文是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從書院到政壇——晚宋理學家的政治活動」(計畫編號: NSC 100-2410-H-002-118-MY3)的成果，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修改意見，獲益良多，謹致謝忱。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毛詩正義》，收於國立編譯館十三經注疏小組編，《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臺北：新文豐，2001，據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影印。
- 不著撰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收於《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史部，北京：北京圖書館，2006，據復旦大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本影印。
- 不著撰人，《咸淳遺事》，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0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方大琮，《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宋別集類，第89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正德八年(1513)方良節刻本影印。
- 方回，《桐江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本》，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據館藏傳錄明弘治十四年(1501)范文恭抄本影印。
- 王應麟，《四明文獻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王邁，《臞軒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79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影印。
- 佚名，王瑞來箋證，《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10。
- 佚名，汝企和點校，《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據宋刻元校本及宋刻本點校。
- 佚名，張富祥點校，《南宋館閣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8。
- 吳潛，《許國公奏議》，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84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抄本影印。
- 李心傳著，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收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唐宋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據適園叢書本為底本點校。
- 李昉英著，楊芷華點校，《文溪存稿》，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
- 李賢等，《大明一統志》，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9，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中山大

學圖書館藏明天順五年(1461)內府刻本。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周密著，周企明點校，《癸辛雜識》，收入《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唐宋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8。

周密著，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

俞德鄰，《佩韋齋集》，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洪咨夔，《平齋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74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影宋抄本影印。

胡知柔，《象臺首末》，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史地類，第 10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據指海本排印。

胡聘之編，《山右石刻叢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 1 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據清光緒己亥(1899)至辛丑(1901)年刊本影印。

徐象梅，《兩浙名賢錄》，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傳記類，17-18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據明天啓徐氏光碧堂刻本縮印。

徐碩，《至元嘉禾志》，收入《宋元地方志三十七種》，第 12 冊，臺北：國泰文化事業，1980。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本影印。

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3。

陳宓，《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73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抄本影印。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

楊簡，《慈湖先生遺書》，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1，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刊本影印。

劉一清，《錢塘遺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劉克莊，王蓉貴、向以鮮點校，《後村先生大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

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劉宰，《漫塘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鄭元祐，《遂昌雜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4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鄭真輯，《四明文獻》，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1935 年張壽鏞氏約園排印本。

鄭獬，《鄮溪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 263-267 冊，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烏程劉氏嘉叢堂藏宋刊本。

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3。

## 二、近人論著

小林晃，〈史彌堅墓誌銘と史彌遠神道碑——南宋四明史氏の伝記史料二種〉，《史朋》，43(札幌，2010)，頁 1-17。

方震華，〈軍務與儒業的矛盾——衡山趙氏與晚宋統兵文官家族〉，《新史學》，17：2(臺北，2006)，頁 1-54。

方震華，〈轉機的錯失——南宋理宗即位與政局的紛擾〉，《臺大歷史學報》，53(臺北，2014)，頁 1-35。

李天鳴，《宋元戰史》，臺北：食貨出版社，1988。

夏令偉，〈論史浩的兩次拜相及其原因——史氏相權與趙氏宮的關係研究之一〉，《浙江海洋學院學報(人文科學版)》，27：1(舟山，2010)，頁 40-45。

張金嶺、吳擎華，〈晚宋理學家對僭越權力的加入、疏離與抗爭——立足于晚宋時期理學家為濟王鳴冤的考察〉，《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0：4(成都，2003)，頁 91-99

葛兆光，〈回到歷史場景——以宋代兩個關鍵詞為例談哲學史與思想史的分野〉，收入葛兆光，《古代中國的歷史、思想與宗教》，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166-174。

葛兆光，〈洛陽與汴梁——文化重心與政治重心的分離——關於十一世紀 80 年代理學歷史與思想的考察〉，《歷史研究》，5(北京，2000)，頁 24-37。

關長龍，《兩宋道學命運的歷史考察》，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年。

Davis, Richard.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The Spirit of a Prince Haunted the Country: “The Affair of Prince Ji”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Late Southern Song China**

Cheng-hua F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hen Emperor Ningzong died in 1224, Chancellor Shi Miyuan successfully enthroned Zhao Yun as Emperor Lizong, and another imperial son, Zhao Hong, who had been adopted as Ningzong's son in 1221, was ennobled as Prince Ji and ordered to leave the capital and go to Huzhou. After a short-lived coup attempt to enthrone Prince Ji failed in early 1222, Zhao Hong was murdered by Shi Miyuan's agent. Controversy erupted lasting the next fifty years. Protestors insisted the innocent death of Zhao Hong would cause Heaven's anger, which would eventually punish the Song with disasters. The appointment of Zhao Hong's heir could represent the emperor's confession of his mistake be an efficient method to quiet the anger of Heaven. However, Emperor Lizong and his successors considered the heir of Prince Ji as a potential threat to imperial authority, and so they tried to prohibit this request by punishing the protestors. Even though many officials were demoted for arguing on behalf of the heir of Prince Ji, most civil officials and literati still believed that it was the only way for the emperor ease Heaven's anger and solve the state crisi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bureaucrats resulted in the instability of Song politics. Even after the end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fact that the emperor had refused to appoint an heir of Prince Ji was considered by literati as the primary factor causing the decline of the Southern Song.

**Keywords:** Song Lizong, Prince Ji, Neo-Confucianism, loyalist armies, Shi Miyuan